

中法建交背后的博弈



1963年10月,周恩来会见戴高乐总统代表、法国前总理富尔(中)。

法国是首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西方大国。2014年是中法建交的第50个年头,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底对法国的访问,被视为双方关系进一步巩固的标志。

尽管中法当年联合发表的建交公报只有44个字,其背后仍隐藏着一段波澜起伏的博弈。

有官方色彩的私人访问

开启中法友好关系大门的使者,是一位面相斯文的法国老人——埃德加·富尔。富尔与戴高乐私交甚笃,两度出任法国总理。

1963年8月20日,富尔利用去瑞士度假的机会造访了中国驻瑞大使李清泉,提出访华并面见毛泽东、周恩来。富

尔1957年到中国时,这两位领导人曾与他见面。富尔神秘地告诉李大使,此访有官方色彩,因为他要向中国领导人转达戴高乐总统的亲笔信,但行程仍须保密,对外宣称只是私人举动。

接收到这种“微妙信号”的中国政府,悄悄提高了接待富尔的规格。同年10月21日,富尔夫妇来到中国。他和夫人直接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。

事后,富尔在给戴高乐的汇报中提到,“中国官方表现出对来访者的高度关切和信任。”

戴高乐放不下那份高傲

中苏分歧是法国承认新中国的推手之一。1964年,时任法国驻美大使阿尔方表示,“直到去年为止,世界共产主义还是铁板一块,只要与惟一的一个首都建立关系就可以决定共产主义各国的命运。如今,中国与苏联分裂,就有必要同北京直接对话,对其态度应当像对苏联一样,也要像承认苏联那样承认中国。”

另一方面,二战后,戴高乐立志重振“高卢金鸡”的雄风,不愿继续扮演华盛顿的小跟班。他深信,“在亚洲,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,任何协定、任何条约都将是无效的”。

虽然打算主动与中国修好,戴高乐

并不情愿放弃法国人的骄傲。富尔被引见给周恩来时,对青年时代赴法留学的后者说“是时候再到巴黎了”。用如此委婉的方式传递信号,正是戴高乐亲口交待的。他在给富尔的信中强调:“严格讲,我们无求于人。”由此,富尔特别向中方提出:“将要作出的决定不应包含任何前提条件,这将侵犯我们的自尊,与我们非要求者的身份不符。”

这里所谓的前提条件,实际上就是指台湾问题。

力促台湾当局知难而退

1964年1月31日,戴高乐在爱丽舍宫召开千人记者会,亲自宣布承认新中国。

既然建了交,互换大使是必须的。出发前,邓小平嘱咐临时代办的宋之光,此行的首要任务是“驱蒋”,如长期无法解决,中国就会撤回代办。此刻,戴高乐更焦急,如果台湾代表执意留在巴黎,导致“该走的不走,不该走的走了”,法国政府只怕会成为国际笑柄。

然而,台湾代表不打算默默地消失。同样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的美国方面也相信,台湾不与法国主动断交是“能使戴高乐受点挫折的惟一机会”,遂撺掇蒋介石不要“知难而退”。

解密中国首次打捞坠机内情

一圈,两圈,三圈,大连海域上空,一架MD-82客机在盘旋三圈后,突然拖着浓烟烈焰冲向海面。这是2002年5月7日,中国第一起民航飞机坠海事件,机上112人全部遇难。

搜救船到达事故现场后,首要任务是打捞遗体 and 飞机残骸。此时海面上漂浮着燃油、飞机座椅和残碎肢体,海军官兵用抬、抱、托举等方式打捞泡涨的尸体。第二天凌晨,22具遗体被运回大连港,但失事飞机的位置仍是谜团。面对二十几平方公里的茫茫海域,中国打捞客机的经验一片空白。

在水下寻找粉身碎骨的飞机

打捞组决定采用侧声纳——向海底发射声脉冲并接收回波,根据回波信号到达的时间、强度,画出一条条扫描线,形成连续图像,可是图像中始终没有这架飞机的身影。专家决定采用打捞行业的土办法——拉网式搜索,即在两条船之间拴一条钢缆并前行,如果水下物体绊住钢缆,潜水员立刻下水勘查。根据

零碎信息,在海域中划出一个可能范围,然后逐步缩小直至触摸到目标物。

根据目击者提供的飞机入水位置、第一具尸体发现位置等信息,打捞组划出一块边长1500米的正方形区域,对其进行拉网式拖扫搜寻。

28小时后,钢缆被机头绊住,这是打捞中拨云见日的一刻。但直至见到拖拽出水的机头,专家才恍然大悟:飞机发生了强烈爆炸,近乎粉身碎骨,旁侧声纳很可能早就扫到了飞机残骸,只是操作人员未能及时识别。

黑匣子的信号发射器掉了

与此同时,另一个重要目标黑匣子的打捞,却始终毫无进展——它只有普通鞋盒大小,这意味着这个“圈”必须划得足够小。搜救人员先后从大连、哈尔滨、沈阳调来设备扫测,毫无结果。唯一的渺茫希望,是大连重工集团760所用自制的探测仪,收听到了黑匣子发射的信标声脉冲。

黑匣子盒体的一端,卡着一个小小

的圆柱体,叫做水下信标。信标上的海水电池在触水后,开始给信标供电,使其连续30天、持续不停地发射37.5KHz的声脉冲,便于搜寻。

不过,虽然能收到声脉冲,却无法确定方向来源。5月12日晚,美国专家前来协助打捞。美国人带来了声纳信标定位仪。操作方法颇原始:将声纳转换器插入水中,操作人员戴着耳机、手持放大器接听信号,如果听到黑匣子发出的“滴答”信号声,声音越大,靠得越近。

13日凌晨3时14分,“听到了!”美国专家一声惊叫。这已是寻找黑匣子的第五天。遗憾的是,打捞上来的信标已与黑匣子分离,而黑匣子本身并不发射声脉冲。专家此时只好依赖常识判断——黑匣子可能就在信标附近。

在信标周围摸索一番后,探寻了将近五天,终于找到了黑匣子。

历时12天,关键的打捞工作基本结束。

《老人生活报》2014.3.24文/孔令钰

呀!这个会开得很好!就是要斗一斗她,她是从来不接受批评的!”

邓小平在与“四人帮”作斗争的同时,还要致力于解救国家于危难的全面整顿。

此时,病重的毛泽东,根本上是希望双方能妥协,进行合作。很快,作为中央联络员的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加入了“四人帮”的行列。他向毛泽东汇报说,邓小平将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和生产斗争“三项指示为纲”变成了一条,即“以生产斗争为纲”……

这些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。这位视“文化大革命”为杰作的伟人,感到选错了“接班人”。在1976年清明节群众自发地借怀念周总理、向“四人帮”宣战的“四五”运动中,“四人帮”借此诬陷邓小平为翻案的“总后台”。造成了邓小平的第三次被打倒。

意味深长的是,毛泽东虽然拿下了邓小平,但仍保留了他的党籍。而且,他并没让“四人帮”得势。他在一个特定场合谈起“接班人”问题时,对“四人帮”中的任何一个也未提起,同时对老同志也未纳入考虑。最后,他选择了平和、朴实和厚道的华国锋……

《党史博览》2014.3.12

面对北京的持续施压和台湾对“劝退”的充耳不闻,法国政府惟有选择摊牌。2月10日,法国外交部明确告知台湾当局,一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人员抵法,“中华民国”的使领馆将失去存在的理由。翌日凌晨,台湾正式宣布与法国“断交”。

台湾外交人员虽已撤走,却不肯放弃乔治五世大街的馆舍,专门派人把守。中国先遣队决定另找地方,用于临时办公。他们看中了巴黎西北郊诺伊居住区内一栋带花园的三层洋房。谁知,中国外交官刚以110万美元买下房子,突然生了变故:房主变卦了。

原来,美国情报人员威胁女房主,如果把房子卖给中国人,就永远不许她入境。经宋之光反复劝说,她才如约交房。先遣队随即展开安全检查,结果在客厅一角发现了窃听器,只是安装手法相当业余,大概是女房主在美国情报人员威逼利诱下勉强装上的。

时至1967年,戴高乐亲自过问了乔治五世大街11号的房屋,巴黎地方警察接到命令,把躺在地上的不肯走的台湾留守人员强行抬了出去。数日后,中国驻法外交团队“喜迁新居”,此后半个世纪,五星红旗便一直在这栋华美的建筑物上空飘扬。

《青年参考》2014.3.26文/张慧

俄罗斯警卫人员回忆：

陪护外国第一夫人轶事

弗拉基米尔·亚力山德罗维奇·库兹涅佐夫曾在苏联－俄罗斯国家警卫局工作32年,多年从事陪同与保卫外国元首夫人的工作。他向俄罗斯《共青团真理报》讲叙了他经历的种种轶事。

招待首相女儿险些引发外交事件

1973年,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苏,其女儿田中真纪子陪同出访。库兹涅佐夫第一次单独上岗,承担了保卫田中真纪子的重任。

当时,田中真纪子自己有一套日程安排,其中一项是参观游览莫斯科郊外的金环古镇扎戈尔斯克。日方女翻译告诉库兹涅佐夫,真纪子交待早7时叫醒她。可当库兹涅佐夫7时整赶到宾馆时,女翻译却不在,日方警卫说他们不敢叫醒她,怕被炒鱿鱼。最后,警卫队长出主意让库兹涅佐夫自己去叫醒真纪子。

库兹涅佐夫没多想便去敲了首相女儿的房门。真纪子应声开了个门缝儿,招呼他进房间,并背过身将一条丝带交给他,请他帮扎紧身衣。由于丝带太滑,加上心里忐忑不安,库兹涅佐夫花了12分钟才帮真纪子系好。

就是这短短的12分钟,让库兹涅佐夫差点儿丢了工作——据说日本人认为他有违反外交礼仪的举动。上级也把库兹涅佐夫叫去询问这件事,他如实地作了回答,这件事总算过去了。不料9个月后,田中真纪子生下了儿子,库兹涅佐夫又被上级叫去问这件事,他只得再次作了解释。

外宾巨款购物让人大开眼界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,一位近东国家的首脑访问苏联,库兹涅佐夫担任其夫人的警卫队长。这位第一夫人酷爱购买礼品。一次,第一夫人来到“小白桦”,走到挂成一排的水貂皮大衣跟前,试穿几件后表示要统统买下。然后又来到首饰柜台前,要把摆在陈列柜里的珠宝统统买走。库兹涅佐夫惊愕之余,小声询问翻译,他们是否带了足够的钱。翻译官指了指第一夫人保镖携带的密码箱,意思是那里面有的是钱。

果不其然,等保镖打开箱子,就看见里面成捆面值100美元的大钞,把店里的苏联人看得眼睛都发直了。库兹涅佐夫说,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。

环球网 2014.3.25文/栗周熊

邓小平从第二次复出时开始,就同“四人帮”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

在1975年4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,邓小平、叶剑英等人又同“四人帮”发生了交锋。由于江青等人无理取闹,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“上海帮”进行了严厉地批评。

5月3日,毛泽东自去年7月17日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“四人帮”之后,针对宗派主义尚未得到遏制的问题十分恼火,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对“四人帮”进行批评。

在随后召开的5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,邓小平理直气壮地对江青一伙搞的所谓“第十一次路线斗争”、“批林批孔批走后门”和“反经验主义”,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人这三件事进行质问:“倒是要问一问,为什么钻出这三件事?”并说:“不搞掉派性不行。”

他义正辞严地说:“你们批周总理、批叶帅,无限上纲,提到对马列的背叛,当面点了那么多人名,来势凶猛。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,这件事就那么雷厉风行?!”

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会议主题,指出: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,是根据毛主席

邓小平痛批江青

毛泽东：就是要斗她

的指示和讲话精神召开的,要“三要三不要”,首先政治局同志要做到。主席多次批评宗派主义,警告不要搞“四人帮”。

邓小平主持召开两次政治局会议,把批评“四人帮”作为中心议题,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当面质问和批评,这不仅是“四人帮”进入政治局以来没有过的事情,也是“文革”9年来前所未有的事情。

经过这次面对面针锋相对的斗争,江青不得不妥协,并代表“四人帮”于6月28日写了一份检讨:

主席、在京政治局各位同志:

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。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,思想触动很大……当我认识到“四人帮”是个客观存在,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,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,达三四次之多。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。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……

获悉政治局两次会议情况,并听说江青的检讨后,毛泽东很高兴:“好